

李润东

编者按时间是哲学中的永恒之谜，它派生出来的认识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人生的此岸与超越的困惑，被本文作者又一次通过对传统的佛、道及西哲康德的未果追求的描述提了出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黑格尔企图从认识上给出答案，最终又被绕了进去。他提出“真无限”即“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封闭圆圈”，抛弃把无限视为有限量的延伸或积累的“坏无限”。但可说是“真无限”的现代所谓四度球体，却算出了宇宙的空间半径和存在时间，实际上仍是有限。存在问题亦然：“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不也经常困惑于“此岸”与“彼岸”的矛盾而凝成现代哲人海德格尔的“忧、烦、畏”吗？是选择皈依上帝，还是把“超越”建立在“此岸人际”“感性世界”寻求“诗意栖居”——以人生理想、生活价值肯定、许诺人们的生命和生存，使自己的有限性和主客观时间具有可无限延伸的“内容”和“意义”？这正是“走在路上”的人们值得思考的。

“认识”问题在哲学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事实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哲学本身也是人类为认识世界本质所做的不懈努力的体现。本文即试图对康德、庄子、佛陀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一粗浅的讨论和比较。

在西方哲学史上，说到“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想到康德的伟大成就。他之所以把认识论问题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是由于他感到，当时的形而上学要么限于独断论的各执一辞，要么被怀疑论者加以取消，然而这种情况恰恰要求一种真正可靠的形而上学的诞生。为此，他认为，在人们对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之前，应该先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形而上学是可能的吗？”于是，康德对形而上学的知识应具有哪些特性作了一番讨论。首先，它要区别于来自经验的形而下的知识，因而只应包含先天判断。再者，分析判断本身不能真正增加我们的知识，所以“形而上学只管先天综合命题，而且只有先天综合命题才是形而上学的目的”。(康德，第26页)这样，就不得不先回答：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转向对纯粹数学和纯粹自然科学有效性的分析。他看到，“数学必须根据纯粹直观”(康德，第39页)，数学要求一种先于对象存在的对对象的直观。这样，就要求我们抛弃直观按照物本身那样来表象物这样一种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看法。接着就引出了他的认识论中一个重要的论断：我们只有也正是凭着感性直观的形式才能先天地直观物，而且“只能按照物所表现给我们那样，而不按照物本身那样来认识它”。(康德，第42页)这样的直观就是时间和空间。这就是说，是因为人们先天地具有了时间和空间这样的感知形式，才使人们对万物的经验的直观和认识成为可能，而不是先有了时间和空间这样的独立于人的实在，才使我们经验到了时间和空间。感性认识如此，知性的认识同样由于我们先天地具有范畴的知性形式而得以可能。但这可能同时也意味着局限。康德并不怀疑物自身的存在，但是他要人们注意，我们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如果把对于现象的认识归于对物自身的认识，就会产生谬误。

许多人也许会认为康德在这个问题上太过谨慎了，但不如此苛刻地要求，势必会使形而上学重新陷入原来的境地，形而上学的真知就不会产生。人的理性要求认识终极的实在，但我们被赋予认知能力的同时，也注定了我们的目的永远不能最终达到。强不知以为知的结果，只能是陷入“二律背反”一类的情况：既可说是，又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不是，结果于获得真知没有半点益处。像康德这样真诚而深刻地思考认识，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他在那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中表达的对于星空深深的敬畏，再好不过地表达了自己作为渺小的人类之一员，对于宇宙这个自在之物不可知的感慨。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接下来，说一说庄子在“认识”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西方哲学转而讨论东方思想，并作一比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从西方哲学角度来看，认识是与实践相对的一个范畴，来源于几乎贯彻西方人思维始终的主客体二分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则有“知”和“行”的概念，但若以此比附，是否妥当，却是件成问题的事，况且庄子的思想，本来就超出了这类人为的划分。不过差异也是由于要求同才得以产生，不如“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庄子释译·齐物论》)，反复相明吧。那么在庄子看来，怎样就是“知”，怎样就是“不知”呢？庄子通过对是与非的一番讨论，先把这个问题架空了。他说，人们认为是或非，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是或非，本没有实在的根据，这一点不过是被言辞掩盖罢了。人们为了认识世界争来争去，这本身也不过是众多现象之一，无异于刚出壳的小鸟的叫声，为什么要特别地加以计较与追求呢？

要说有是与非，那必定先要有一个标准，可是本来就没有一个确实的标准存在；设想某种客观实在来支持自己的看法，最终不过是兜了个大圈子，硬是声称自己是正确的，只能骗骗那些朝三暮四的猴子。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不执于是与非，就能因其所是，成其自然了。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康德的人只能认识现象而不能认识物自身的观点。人所认识的，并不能归结为物的特性，而是由人的先天认知形式决定的。庄子则远远超出了人的尺度。既然认识因人而如此，那也就是说它不必如此。根据一套先天认知形式，固然可以得出一个理论体系，但一个人的“先天”并不一定就是另一个人的“先天”。

西方哲学建立在概念、判断、推理之上，若执于此，则很难领会中国古代思想的精髓。那么，怎样才算是真知呢？“且有真人，然后有真知”。(《庄子释译·大宗师》)《庄子》一书中多处描述了真人的境界。所谓真人，能与天地浑为一体，一切顺应大道而不刻意为之，不贪爱什么因而也不会受到伤害。人本来就是那自在之物而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依着道的运行而运动不息生灭不止，

何必有所分别而叠床架屋地去认识什么？“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庄子释译·养生主》）道不可由思想和语言去抓住，因为道不是任何对象性的思维能够把握的，它存在于万物之中而又生发出万物，执于思想认识而以为得到了道，其实还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道呢。“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庄子释译·天道》）知道了言说的真义，又何需言说？

或许正是人的不完美才促使人类一刻也不停息地去认识包括自己在内的世界。人们不满于世界的不停息的纷乱和无从把握，希望抓住那似乎隐约存在于其背后的永恒不变的实在。人们用自己的思想，借助概念、语言和逻辑，不停地言说并通过记录加以挽留，以期通达于彼，这大概也是面对无常带来的困惑和不安，给自己找到一点可以得到安慰的理由。证悟了终极境界的人，或许从来都不需言说以证明自己的真知。而作为证悟者的佛陀，要帮助众生也达到同样的证悟，又不得不有所言说。于是佛陀因众生所是，因材施教，根据各人不同的情况和认识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不过其中有一些普遍的原则，例如“四谛”，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在这里，佛陀并没有回答哲学家们最关心的世界的形而上的本质的问题，而是让人们先认识到世间充满了苦恼，苦恼是有原因的，并且可以灭尽，寂灭解脱有道可循。

事实上，当时常有人向佛陀提出形而上学的问题，例如：宇宙是永恒的吗，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身与心是同一物吗，佛的境界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这里面有当今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也有康德用以推出矛盾从而说明世界本身不能认识的问题，而佛陀对这些问题一概保持了沉默，因为认识这些问题对达到最终的目的没有丝毫助益，只会把人引入歧途。最终的境界只能依照正确的方法，通过自己努力实践达到，本身不是仅仅用语言就能说清的。正确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但认识本身是不可执为实有的。佛陀曾言，诸佛境界不可思议，众生思议诸佛，心即狂乱。试图用思辨、逻辑认识终极奥秘，得到的只有困惑。“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释译·齐物论》）；现代人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言说的东西，应当保持沉默”。我们再次遇到了局限。

综合起来，以上的论述都说明了一点：认识或存在遇到终极问题时，不免暴露出自己的局限；不论是对物自身、道还是佛教追求的终极境界而言，都是如此。可以说，只要我们还有所认识，我们就还在路上。什么是认识？为什么要认识？谁在认识？认识什么？人对世界的认识更像是人自己和自己玩而又不得不玩下去的一场游戏。

参考文献

- 康德，1978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殷阳景贤、欧阳超，1986年：《庄子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

（作者系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责任编辑：王生平（《哲学研究》2003年第11期）